

邊疆教育、文化網絡與 國家權力的擴張

——以抗戰時期西雙版納為例(1935-1945)

● 張夢婷

摘要：自1931年起，國民政府提出「邊疆教育」並開始關注邊地少數民族的教育問題，但直至1930年代中後期，隨着抗日戰爭的推進和西南地區戰略地位的上升，西南地區的邊疆教育才得到重視。抗戰背景下的邊疆教育具有啟發民智和抗戰動員的雙重意義。本文以西雙版納省立車里小學和省立佛海簡易師範學校為代表，通過討論1935至1945年間新式學校的建立及推廣過程，探析國家權力在推廣新式教育的過程中，與西雙版納社會原有文化網絡中的佛寺體系、傣泐政權以及廣大民眾所發生的互動。國家通過與佛寺體系的和解，將佛寺的教育功能剝離出來；通過將傣泐政權核心成員納入新式教育的推廣體系，分化了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共享利益；通過組織學校師生進行抗戰動員宣傳和漢語普及，啟發了民眾的國家意識。代表國家文化的漢語、現代知識和國家意識開始滲透到傳統的文化網絡中，為國民政府在西雙版納權力合法性的構建提供了空間。

關鍵詞：邊疆教育 文化網絡 國家權力 佛教體系 傣泐政權

一 前言

自西雙版納在明朝初年被納入中國土司政治體系之日起^①，國家及其代理人在政治、軍事及文化方面對西雙版納的滲透就未曾停止，只是依據國家的實際需要和自身實力，在不同時期的滲透力度不同。在中國西南邊陲西雙

* 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韓孝榮教授的大力支持，筆者在此衷心感謝韓孝榮教授的教誨。筆者並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及編輯部對本文提出的寶貴建議。

版納社會內部，傣泐族群政治和文化居於社會的中心位置，國家的形象和象徵符號則處於社會的邊緣。在抗日戰爭的推動下，國家在邊地推進「中心化」進程變得尤為迫切。為了實現全民總動員，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提出中國只有一個民族——中華民族，「中華民國的國民=中華民族」，力圖建立一個與國家等大的民族，強調從文化上進行民族同化^②。然而，相關理念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難以貫徹：「就車里十餘萬擺夷來說，他們名譽上雖歸入我國版圖有六百多年的歷史，然至今尚通行其己族的語言和文字，信仰印度的佛教，服從土司的威權，且特殊的社會組織和生活的方式，恰與中國文化分道揚鑣」^③；「思普沿邊的荒地，擺夷拒漢人前往開殖。唯有普及邊民教育，可以促進全民族休戚相關精神與生活協作」^④。抗戰時期，教育作為一種手段，是達成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語言文字統一，實現漢語普及、國族建構的重要實踐形式之一^⑤。

邊疆教育在西雙版納的推廣面對的不僅是佛寺體系在地方社會中的影響，還有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所建立的共生體系^⑥。在西雙版納傳統社會中，佛寺承擔着教育教化、布經散道等多項功能，在政治文化上為傣泐政權的合法性提供解釋，在俗事上影響着傣泐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相互交織構成一個統治着西雙版納的文化網絡。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在研究新舊世紀之交的中國華北鄉村社會時，發現文化網絡才是地方社會運行的機制，從而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地方社會中的權力存在和施展，依賴宗教、政治、經濟、宗族和親朋交往等各種關係所組成的文化網絡；體現在各種文化的規範和象徵符號，如宗教信仰、相互情感、親戚紐帶，通過與制度和組織交織在一起，賦予文化網絡以權威^⑦。在西雙版納社會，原有的傣泐語言、宗教教義、宗教信仰等文化象徵符號通過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傣泐族群的文化網絡，傣泐文化是相對軟弱的最高統治者「召片領」得以統治整個王國的精髓，文化網絡為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提供了權力合法性^⑧。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與民眾形成了庇護與被庇護、信奉與被信奉、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

國家權力長期無法發揮實質性作用的原因之一，就是漢語、現代知識、國家意識等代表國家文化的象徵符號無法進入到由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所構建的文化網絡中。在抗戰背景下，國民政府在1935年開始於邊地強勢推進新式教育。目前研究對民國時期的邊疆教育已有所關注，但往往只關注其負面形象^⑨，沒有關注這一時期邊疆教育所取得的部分成效。此外，現有研究成果對邊疆教育與傣泐政權和佛寺體系的關係和影響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雖然楊清媚留意到，原來在西雙版納社會中與土司制度相契合的宗教體系在清代科舉制、民國現代教育及民主改革的衝擊下出現衰退，但認為邊疆教育的收效並不顯著，佛寺仍舊為國家推行邊疆教育的一個主要障礙^⑩。

因此，民國時期新式教育和傣泐政權、佛寺體系所進行的互動還有待進一步討論。雖然邊疆教育在西雙版納的推廣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也沒能形成對佛寺教育的壓倒性優勢，但這一時期還是有更多的非漢族群參與到新式